



庐陵文化研究丛书

江西省吉安市政协
庐陵文化研究会
编

庐陵人物考论

刘文源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南昌）



庐陵文化研究丛书



庐陵人物考论

刘文源 著

江西省土
庐陵文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庐陵人物考论/刘文源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210-08168-5

I. ①庐… II. ①刘… III. ①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吉安市-古代 IV. ①K820.8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5119号

庐陵人物考论

刘文源 著

责任编辑:陈世象

封面设计:揭同元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学术出版中心电话:0791-86898330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15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swwpublic@sina.com web@jxp-ph.com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10.25

字数:270千字

ISBN 978-7-210-08168-5

赣版权登字—01—2015—103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36.00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吉安,古称庐陵,自古就是“吉泰民安”之地,素有“江南望郡”“文章节义之邦”等美誉。庐陵不仅历史悠久,地沃物阜,经贸繁荣,而且尊师重教,文风昌盛,人才辈出。从唐宋至明清,庐陵先后出了17名状元,近3000名进士,涌现了一代文宗欧阳修、民族英雄文天祥、江南才子解缙、爱国诗人杨万里、农学专家曾安止、地理学家罗洪先等名士先贤,形成了“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照汗青”的历史盛况,留下了“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精彩传奇。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关于庐陵人物的逸闻轶事散落民间,日渐消亡,亟需抢救、挖掘和整理。

市政协庐陵文化研究会编辑推出的《庐陵人物考论》,专题研究庐陵人物,填补了这一领域空白和缺憾。该书作者刘文源同志作为庐陵文化研究会理事,长期致力于庐陵文化研究,积极倡导建立“庐陵学”,先后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多部有关庐陵文化的书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庐陵人物考论》是深入考论庐陵人物的一部学术性佳作。该书在庐陵名人辈出的灿烂星河中选取了部分有代表性人物的有关事项进行深入考论,多角度、全方位地再现不同历史时期庐陵人物的风采。作者以史为据,广征博采,稽核考证,删繁就简,把庐陵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生动鲜活,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回归历史的时空隧道。该书亮点纷呈,富有特色。一是内容新颖。作者多年来潜心于庐陵人物研究,挖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如《欧阳修怎样修改文章》《有关罗大经生平事

迹的几个问题》《生祭文天祥的王炎午、王幼孙》等文,均属原创作品,首次面世;《唐、五代时期的吉州诗人》中的不少古诗和《〈永乐大典〉吉安编纂人员考》中的很多素材,均是鲜为人知的原始资料,弥足珍贵。二是观点独到。作者精心考证,用心思考,书中内容叙事据实,分析有据,言之有理,观点鲜明。如《玉笥湖洲花门楼习氏谱系源流考》,以认真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对习氏的迁徙和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姓氏,可以像中华民族的姓氏那样,帮助人们从现代一直上溯到混沌初开”等观点;不少文章结尾部分对所考论庐陵人物进行了精辟的总结,提出了很多发人深思的观点和看法。三是文风朴实。该书不矫揉造作,不刻意雕饰,文风朴实,通俗易懂。如对许和子、欧阳守道、张昱、刘同升等庐陵人物的介绍,都是以朴实的语言,紧扣主人公的史事进行考论,做到了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的有机结合,拉近了读者和历史的距离。

“记述往绩,昭尔来兹。”市政协庐陵文化研究会自2009年成立以来,始终秉承“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宗旨,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倾力挖掘、保护、研究庐陵文化,已出版《吉安历代进士录》《解缙传说整理与研究》《庐陵宗族与古村》《周必大生平和思想研究》等一批研究庐陵文化的著作,丰富和充实了庐陵文化研究内涵,传承和弘扬了庐陵文化精神,为促进吉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注入了正能量。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传承弘扬庐陵文化、繁荣文化精品创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市政协庐陵文化研究会出版《庐陵人物考论》,就是希望“扬弃继承、转化创新”,通过挖掘、保护、研究庐陵先贤事迹,诠释庐陵精神,彰显核心价值,展示家园情怀,为广大读者打开一个学习传承庐陵文化的窗口,学习庐陵先贤热爱祖国、

心忧民族、情系家乡的可贵精神品质,为建设开放繁荣秀美幸福新吉安、与全国全省同步小康凝聚新力量,作出新贡献。

是为序。

刘宗华

2015年11月26日

(作者为吉安市政协主席)

论庐陵文化(代前言)

我们现在的吉安,古时候叫庐陵。它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被人们誉称为“金庐陵”。特别是它的人民,尊师重教,崇儒尊贤,知礼行义,兼济天下,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庐陵文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学习、研究和宣传庐陵文化,弘扬其精神,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庐陵文化的含义

西班牙著名教育家奥尔特加·加塞特曾经说过:“文化是时代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大学的使命》)《辞海》在解释“文化”这一概念时指出:广义的文化,是指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机构。

那么,什么是庐陵文化呢?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吉安地区的古代文化。因为现在吉安市所属各区、县(市),历史上曾先后属于庐陵县、庐陵郡。以后庐陵郡虽然改称吉州、吉州军或吉安路、吉安府,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于沿用旧时的称呼,如“庐陵欧阳修”“庐陵杨万里”“庐陵文天祥”“庐陵杨士奇”等。虽然他们不是同一个县的人,但都包括在“庐陵”范围之内。

古庐陵历史悠久: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即设庐陵县(还有新淦、安平二县),归九江郡(治所在安徽寿春)管辖;地域辽阔:北起新淦(县城始在樟树镇,后迁至南市村——今金川镇),南至南埜(今赣

县)。公元236年分立的庐陵南部都尉,其辖地更是远至今大余县),包括现在吉安市所有的区、县、市和临江、抚州(如原乐安县流坑村等地)、赣州、萍乡(莲花县于1992年8月划属萍乡市)等市的一部分地方。新淦在隋、唐时就已归属吉州管辖,至北宋淳化三年(992)才改属临江军,中间有一段较长时间与吉州分离,但它在民国三年(1914)又划属庐陵道,新中国成立后又划归吉安管辖,故从全过程来看,把它归入庐陵文化范围似无可。至于安福,开始时虽属于安成郡(分长沙、豫章、庐陵三郡之地而置),但到了隋朝就已经并入吉州,直到现在未变,所以历代安福人也都是自称庐陵人。北宋安福人刘弇善文工诗词,著有《龙云集》三十二卷。周必大序其文,谓“庐陵自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续韩文公正传,遂为一代儒宗,继之者弇也”。

吉安之名始于元代,那时叫吉安路,明清时则叫吉安府,同时保留了庐陵县。1914年,庐陵县改称吉安县,但又设庐陵道,扩大管辖范围。十年后庐陵道废除,庐陵作为行政区名称才退出历史舞台。今天的吉安,是一个地级市,下辖吉州、青原二区,井冈山市,吉安、新干、峡江、吉水、永丰、泰和、万安、遂川、安福、永新等县,共二区一市十县,面积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三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二十六万余人。

庐陵人是庐陵文化的创造主体,但一些外地人来到庐陵工作或寓居,所写的有关庐陵的作品,也应该归入庐陵文化的范围,他们同样为庐陵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提到杜审言、颜真卿、苏轼、黄庭坚、江万里、王阳明、方以智、施闰章等人。他们在庐陵的惠政或业绩,将永远留存在庐陵文化史册上。

二、庐陵文化的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全国各地的区域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

文库总序》)。庐陵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的区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主要有:

(一)科举考试创佳绩

隋、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废除了九品中正制,而采取分科取士的办法来选拔人才和任用官吏。因此,进士的多少,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地方文风是否昌盛、教育是否发达、人才是否众多、声望是否显著的重要标志。有人统计,从唐至清,全国进士有98689人,其中江西进士为10560人,吉安进士约2800人。江西占全国进士数的10.7%,吉安占江西进士数的四分之一。以一府来说,吉安进士数可能在全国居第一位,其次是苏州(历代进士为1771人)。

进士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一个人若能考取进士,那就很不错了;如果考中了状元,那更是了不得,他的家庭、宗族、村庄甚至县、府、省都会因此而倍感荣耀。历史上,江西出了41名状元、28名榜眼、35名探花,其中吉安的状元是17人、榜眼16人、探花15人,占了全省前三名进士总数的近一半。此外,还有会元(省元)15人、解元93人。以状元数来说,苏州历代状元45人,居全国第一位,其次大概就要算吉安了。

特别使人惊异的是,明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连续两届全国科举考试,一、二、三名全为吉安人所夺得,创造了蝉联两届全国科考团体冠军的奇迹。此外,永乐十六年(1418)、正统元年(1436)的全国科考,二、三名是吉安人;天顺八年(1464)、成化十四年(1478)的全国科考,一、三名是吉安人。明代全国状元共有89名,其中江西状元17人,居全国第二位(浙江状元20名,占全国第一位)。若以府为单位计算,吉安有12名状元,无论在全省或全国都稳居第一位(苏州明代状元只有7人)。此外,明代吉安还出了13名榜眼、12名探花、9名会元、60名解元。

从每届科考的进士数量来看,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丙辰科,吉州

中进士44人(文天祥是该科状元);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壬戌科,吉州中进士更是高达47人(刘辰翁、邓光荐是该科进士)。以州为单位计算,吉州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再从最基层的村庄来看,吉水谷村历史上出了68名进士,其中有父子兄弟进士2组、父子进士5组、兄弟进士7组。像这样的进士村,在全国可能也不多见,大大超过了乐安县流坑村(32名进士)。再如庐陵秀川村(今属吉水县阜田镇)出了31名进士,泰和蜀口村出了21名进士(其中1名探花),永丰湖西村出了15名进士(其中1名状元),安福松田村出了12名进士(其中1名状元、1名会元、2人入内阁)。可以说,进士村几乎遍及吉安各地。

我们还可以从一个家庭来看这方面的情况:宋元丰八年(1085),新淦县(今新干县)钦风乡(今溧江乡)凰山村谢举廉和叔父谢懋、谢岐以及弟弟谢世克四人同登焦蹈榜进士。还有一门同榜三进士的,如明代吉水人解缙与兄解纶、妹夫黄金华同登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科进士第。兄弟同榜进士,则有《鹤林玉露》作者、南宋吉水人罗大经与弟罗应雷同登宝庆二年(1226)丙戌科进士第。不同榜的父子、兄弟、祖孙进士,那就更多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人考取了进士,就等于拿到了仕宦的资格证书。因吉安的进士多,所以被朝廷任用的官吏也就特别多。有人统计,全国历代正副宰相共有2829人,其中江西90人,吉安为17人。江西正宰相或相当于正宰相的有28人,其中吉安为8人(宋齐邱、刘沆、周必大、文天祥、杨士奇、陈循、陈文、彭时),占全省的28.6%。江西副宰相是62人,其中吉安有9人(陈乔、欧阳修、金幼孜、解缙、胡广、萧铤、刘定之、尹直、彭华),占全省的14.5%。明代状元入阁的有11人,其中吉安有3人(胡广、陈循、彭时);官至一品的有10人,其中吉安有2人(陈循、彭时;胡广虽入阁,又为大学士,但官级只有五品)。吉水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五里三状元,一门三进士,隔河两都堂,百步两尚书,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史书上也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说。此外,其他各种

人才也很多。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吉安人在《宋史》上有传的41人,在《明史》上有传的107人。宋、明两代,是庐陵人文的鼎盛时期。

(二)文化科技放异彩

读过中学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语文课本上那篇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文中那位“与民同饮”、“与民同乐”的“文章太守”,乃“庐陵欧阳修也”。就这样,欧公用他的美文,使千百万读者都知道了“庐陵”。

庐陵是有理由骄傲的,因为早在十一世纪,它就孕育了欧阳修(1007—1072)这样的文化巨人。作为文学家,欧阳修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扭转了统治当时文坛的西昆体、太学体的浮靡文风,为宋代散文和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平易流畅的广阔道路。作为一名学者,欧阳修又首倡疑古辨伪、疑经惑传的风气,打开了学术界思想解放的大门,促进了宋代经学的嬗变。他与宋祁等人合纂《新唐书》,还独自撰写《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名占两史,成就是很突出的。此外,欧阳修还在金石学、目录学、谱牒学、人才学、教育学、文艺学等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成为宋学的开创者。作为政治活动家,欧阳修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庆历新政”的改革激流,为改变宋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做出了不屈不挠的努力。晚年,他急流勇退,在地方上做出了许多使百姓满意的政绩。他的一生,正如王安石所赞扬的那样:“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在中国文化史上,欧阳修就像一座高山,其峥嵘气象让人羡慕、令人敬仰。

欧阳修的文品与人品、道德与节操,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后来的庐陵人继承了这个传统,在“文章节义”的道路上迈开了大步。南宋爱国名臣胡铨(1102—1180),义不与奸相秦桧共戴天,他的一篇《戊午上高宗封事》,使金国“君臣失色”,自此“边马不南者二十年”,被人们誉为“功被于中国,名震于边隅,文范于学者”。南宋中兴大诗人杨万里(1127—1206),宁肯丢官,也不为权臣写记,表现出铮铮铁骨的不屈品格。他一生作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余首,是我国文学史上作诗

最多的诗人之一。他写的诗通俗易懂、清新自然、活泼生动,被称为“诚斋体”,享誉文坛,永载史册。

有人统计,《全宋词》作者1397人,其中江西作者174人,占12.46%,居全国第二位(浙江第一)。在江西作者中,吉安52人,占全国的3.7%,占江西的29.89%。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则著录吉安人的著述381种、6168卷。不难看出,这些数字的背后,呈现的是庐陵文化的繁盛和斑斓。

庐陵文化繁盛的思想基础是爱国主义。正是这种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与忠诚,促使庐陵人自强不息,奋力进取,在各个领域中都创造出惊人的成就。比如北宋泰和人曾安止(1048—1098),耻于追逐名利,辞官归里,潜心农学,直至双目失明,写出了我国古代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禾谱》,受到大诗人苏东坡的称赞。做过南昌县尉的永丰人曾民瞻,精通天文星象,注意观察日影月形的变化,研制出一种新型晷漏(计时器),并撰有《天文图》《春秋历法》《古今年表》等著作,对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安福人刘元宾(1022—1086),通晓天文地理之学,尤长于医术,被人称为“神医”。宋真宗曾赐号“通真子”以誉之。他著有《神巧万金方》《伤寒论注解》《伤寒括要》《诊脉须知》《脉书训解》《洞天针灸经》等,为中国医学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使庐陵人懂得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他们不断总结生产经验,摸索新的生产技术,使之造福于人类。明代安福人欧阳必进(1491—1567),担任过朝廷刑、吏、工三部尚书。他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有一次,他巡抚鄱阳(今湖北鄱县),正碰上当地发生牛瘟,耕牛几乎死尽,农民无法耕种,严重地威胁着农业生产。面对这一突发灾害,关心民生疾苦的欧阳必进坐卧不安,茶饭不思。经过走访、调研和刻苦钻研,他终于发明了一种可以代替牛拉犁耕地的机械耕地农具——人力耕地机,帮助鄱阳农民战胜了牛瘟,发展了农业生产,稳定了社会秩序。这是一项当时走在世界前列的古代农业科技成就,揭开了耕犁史上新的一页。

在封建社会里,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走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可

明代吉水人罗洪先(1504—1564)中了状元却不作官,而把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地輿学的研究。他花了十几年时间,终于绘制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分省地图集——《广輿图》,在地图学的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

(三)“民物繁庶”甲天下

庐陵人才济济,得力于它的发达的教育;而发达的教育,要靠富足的钱财和物资来支撑。那么,钱和物又从哪里来呢?出路只有一条:发展生产,搞活经济。

依托赣中的特殊地理环境,庐陵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从曾安止《禾谱》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宋时期吉州地区“自邑以及郊,自郊以及野,峻岩重谷,昔人足迹所未尝至者,今皆为膏腴之壤”。其原因,是“江南俗厚,以农为生。吉居其右,尤殷且勤”。特别可贵的是,“独吉之民,承凋惫之余能不谬于所习,吟眈然惟稼穡之为务”。做到了“上下日以播种为俗”,“民无游手,而地无遗利”。这样,生产发展了,人民的生活也就跟着富裕起来,“无流离冻馁之迫,而有饱食逸居之日”。而且,吉州的粮食还大量外运:“漕台岁贡百万斛,调之吉者,十常六七。”“春夏之间,淮甸荆湖新除不续,小民艰食,豪商巨贾,水浮陆驱,通此绕而阜彼乏者,不知其几千万亿计。”另据浙江鄞县人袁燮《絜斋集补》记载,宋代吉州八县每年向官府提供大米58万石以上。可以说,吉州粮食是宋朝大厦的一根重要支柱。

除粮食外,果业生产也是吉州的一大优势。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宋时江西生产柑橘,其中以吉州金橘最为著名。“金橘香清味美,置之樽俎间,光彩灼烁,如金弹丸。”“因温成皇后尤为食之,由是价重京师。”现在遂川县的金橘生产,仍然保持了这一传统优势。

与果业生产相联系的有药材生产。比如新干三湖不但以红橘闻名于世,而且还是闻名全国的“商洲枳壳”“三湖陈皮”的产地。“商洲枳壳”被《本草纲目》列为正品药物,在宋代就是贡品。其他药材,如吉安县固

江的固芷、永和的车前子,在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吉安各县都有种植药材的习惯,故发展药品生产具有广阔的前景。

制瓷业更是吉州的一大生产部门。最著名的,有永和的吉州窑。吉州窑创烧于五代,发展于北宋,鼎盛于南宋,衰微于元代。据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东昌志》记载:“永和名东昌……至五代时,民聚其他,耕且陶焉。由是井落墟市,祠庙寺观始创。周显德初,谓之高唐乡临江里磁窑团,有团军将主之。及宋寔盛,景德中为镇市,置监镇司,掌磁窑烟火公事,辟坊巷六街三市。”当时“锦绣铺有几千户,百尺层楼万余家,连廡峻宇,金凤桥地杰人稠,鸳鸯街弦歌宴舞,读书台士大夫谈今古”。处处呈现出“民物繁庶,舟车辐辏”的热闹繁华景象。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科学家方以智(即药地大师)在《游永和记》中对它的描写是:“估商帆集,万烟骈填。”其规模、气派和景象,真有点像现在的大都市。史载“吉为富州”,那是一点也不假的。

跨越时空,追寻历史的足迹,我们更加惊奇地看到了三千多年前的“青铜王国”。那不到40平方米的一座商墓中,竟出土了各种珍贵文物1900余件(其中青铜器480余件)。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造型之美、铸工之精,不仅为江南之冠,而且为全国所罕见。许多器型、纹饰和铸造工艺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为国内绝无仅有。国家文物部门已将其中的四足铜甗、乳丁纹虎耳铜方鼎、伏鸟双尾铜虎等定为国宝,青铜大钺被誉为“中华钺王”,青铜犁铧等也属首次发现。新干因此而享有“青铜王国”之称,我国江南古代史也将因此而改写。

从殷商时期的“青铜王国”,至宋、明时期的“金庐陵”,历史铺设了一条辉煌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看到了今日吉安的未来!

三、庐陵文化的特点

作为古代的地域文化,庐陵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依托赣中的特殊地理环境,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地方色彩。概括起来,主要有:

1. 文章与节义并重的人生追求

庐陵自古以来就是文章节义之邦。从欧阳修开始,代代讲节义,人学诗文。重节操,擅文章,便成为庐陵人的传统美德和人生追求。我们看到:在民族面临危难之际,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庐陵人自觉地担当起挽救社稷的重任,舍家为国,献身为民,忠烈之气贯九天;在和平时期,庐陵人则把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敢于犯颜直谏,指陈时弊,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铮铮铁骨响当当。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是庐陵文化的灵魂;文章与节义并重,是庐陵名士的人生追求。爱国家、爱民族、爱家乡、爱人民,是庐陵人的最宝贵传统,是庐陵文化的显著特色。

2. 自强不息、奋力进取的开拓精神

《易》是中国哲学的最早源头,具有统合中国文化的根本功能。庐陵人爱读《易》,《易》理在庐陵盛行,这就使得庐陵人具有哲学的头脑,善于分析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能以不懈的努力去夺取前进道路上的制高点,从而开拓出事业的新天地。《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天祥深受《易》的影响,故在《御试策》中提出了“法天不息”的著名论题。他坚持抗元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其他如曾安止写《禾谱》、解缙等人编纂《永乐大典》、罗洪先绘制《广舆图》,亦是这样。

3. 开放性、民主性、学术性的书院教育

庐陵书院创办早,数量多,质量高。它既是教育场所,又是学术活动中心,还是图书出版阵地。具有开放性、民主性的特点。这种书院教育,既适应了科举考试的需要,又培养出了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故庐陵不但进士、状元多,而且忠臣义士、诗人作家、专家学者、能工巧匠等有贡献的人物也多。

4. 崇儒重教、尊老爱幼、行善济贫的社会风尚

庐陵民风淳朴,教育发达。“人于其里,而长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壮者代其负荷于道路。”人人乐道知礼,个个“道德明秀”。大文学家欧阳修回到家乡,写了一篇《吉州学记》,对这种民风

赞不绝口。

5. “民物繁庶，舟车辐辏”的城市风貌

庐陵地处江西中部，得益于赣江这条黄金水道，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非常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比如宋代的永和，由于制瓷业的发展，“辟坊巷六街三市”。其“锦绣铺有几千户，百尺层楼万余家，连廡峻宇，金风桥地杰人稠，鸳鸯街弦歌宴舞，读书台士大夫谈今古。”处处呈现出“民物繁庶，舟车辐辏”（《东昌志》）的热闹繁华景象。

6. 兼收并容的多元化文化氛围

庐陵人善于吸收，勇于创造。新干青铜器就学习了中原文化的先进铸造工艺，展示出赣江流域的地方特色。以后随着中华民族的几次大迁徙和南北文化、中外文化的频繁交流，庐陵文化更是大量吸收了各方面的养料，不断丰富自己，逐渐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文化特色。它包括忠节文化（以“五忠一节”为代表）、书院文化（以白鹭洲书院为代表）、陶瓷文化（以吉州窑为代表）、青铜文化（以新干大洋洲商墓为代表）、佛教文化（以青原山为代表）、道教文化（以玉笥山、武功山为代表）、灯彩文化（以固江鲤鱼灯为代表）、舞蹈文化（以永新盾牌舞为代表）、戏剧文化（以吉水三角班为代表）、药材文化（以新干商洲枳壳、永和车前子为代表）、食品文化（以泰和乌鸡、峡江米粉、安福火腿、遂川板鸭为代表）、民居文化（以浚陂和钓源为代表）和茶文化（以万安神潭茶和遂川狗牯脑为代表）等。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化品种，既互相撞碰，又互相融合，构成了庐陵文化兼收并容、百花争艳的格局。

7. 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

理论思维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庐陵出了许多思想家，他们的学说和思想指引着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文天祥的“法天不息”的政治思想，罗钦顺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何心隐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的文学思想，欧阳守道的教育思想，周忱的经济改革思想，七祖行思禅师的“顿悟”禅法，都是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精华。庐

陵名人辈出,正是这些博大精深思想哺育的结果。

8. 深厚悠久的历史传统

庐陵建县(秦时)有两千多年,设郡(东汉末年)也有一千多年。实际上,它的文化渊源要比它的名字更为古老久远。永丰尹家坪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距今也有三千多年。春秋战国时期则属于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的范围。秦汉以后,经东吴、两晋、隋、唐、五代,发展到宋、明,庐陵文化便进入鼎盛时期。到了清朝,庐陵文化虽处于衰微阶段。但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登上了政治舞台,领导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吉安成了革命的摇篮,这就促使它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进而演进为井冈山文化。这种文化指引着革命的胜利,并成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从庐陵文化到井冈山文化,吉安文化走过了一条光辉的道路,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书写了绚丽的一章。

四、庐陵文化的历史地位

庐陵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不仅在赣文化中占据着十分突出的地位,就是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谈到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所发生的一件震惊全国、震惊世界的事件:1989年9月,新干县群众在大洋洲程家村劳背沙洲取沙土加固赣江大堤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商墓。经考古专家发掘,在不到40平方米的范围内,竟出土了青铜器480余件、玉器1072件、陶器356件,另有属于三个不同个体的牙齿24枚,共1900余件。在一座墓穴中出土了这么多珍贵文物,为我国所罕见;而且这些文物铸造工艺之精美高超,也是绝无仅有的。这证明在远古时期的长江流域,也有黄河流域那样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因此有了新的解释,江南古代史也将因此而改写。可见,庐陵文化的历史地位非同一般。

庐陵人是有理由骄傲的,因为他们不仅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又创造了光辉的陶瓷文化。我们知道,陶瓷是我国